

万有文库

书缘与人缘

唐德刚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书缘与人缘

唐德刚 著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缘与人缘/唐德刚著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. 12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712-2

I. 书… II. 唐… III. 杂著-中国-现代 IV. Z42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2976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
责 任 编 辑	马 芳 赵中男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
封 面 设 计	林 林
责 任 校 对	刘 琛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125
字 数	147 千字 插页 1
印 数	1—6 300 册
定 价	6.70 元

本书说明

唐德刚，生于1920年，安徽合肥人。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士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硕士、哲学系博士。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、纽约市立大学。长期致力于美国史、亚洲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，旁及比较史学。曾在美国创建“口述历史协会”，并十分注重这项工作，笔录和整理出版《胡适自传》、《李宗仁回忆录》等。还著有《胡适杂忆》、《中国国民党的统治：1928—1949年》、《美国对华外交：1844—1860年》、《顾维钧回忆录》、《黄郛夫人回忆录》及长篇小说《战争与爱情》等。

本书收入了作者近二十年所撰写的杂著随笔，既有忆人谈往，又有话书论艺，从中可见作者多方面的才学。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胡适时代·卷土重来

—— 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/ 1

广陵散从此绝矣

—— 敬悼顾维钧先生 / 14

杨振宁·传记文学·瓦砾坝 / 21

陈其宽画学看记

—— 兼论国画现代化 / 30

“纽约东方画廊”观画记感

—— 十大画家,永不再有 / 57

文学与口述历史 / 64

撰写《李宗仁回忆录》的沧桑 / 76

《通鉴》与我

—— 从柏杨的白话《资治通鉴》说起 / 125

《红楼梦》里的避讳问题

——《胡适的自传》译注后案 / 142

曹雪芹底“文化冲突”

——“以经解经”读红楼之一 / 150

海外读《红楼》/ 175

胡适时代·卷土重来

——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

讲稿之一

引言

胡适之先生逝世时，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，只是：（一）写封长信给胡夫人；（二）在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。今天来作“二十五周年祭”，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。胡夫子道之不行，责恨以终，死不瞑目。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，希望能搞出个“胡适的复活节”来，所以我用了“卷土重来”这个成语作讲题。胡氏其人虽死，其说长新，又将光照天下。我是为着这一点，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。

我是胡适最失意时期的学生

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分、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：又，第一个条件，我是胡适的学生。胡氏是教育家，授徒半世纪，桃李满天下，生徒数万人——良莠不齐，拥、反、左、右、独（独立思考）各派，皆人山人海，门生遍天下——我也是个门生

和小门生之一，千万人其中之一而已。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“一‘生’之言”，请众“生”指教，此其一。

但是，在这个有队伍上万的学生大队里，如果说傅斯年、罗家伦、张国焘、毛泽东等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“开山门生”，什么俞平伯、千家驹、吴健雄、苏梅算是“第二代”学生……等而下之，则有四、五代乃至六、七代之多了。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。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，我也从未否认过。做胡老师的学生，不是什么名誉学位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，但也不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。但是我这个学生，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，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，但是我却单独上过“胡适学”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，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，前所未有的事，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、延宾客，我是真正的在上课——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！——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，此其二。

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、最孤独时代的学生——胡氏自幼“暴得大名”，一生荣华富贵，平时得意非凡，意气风发。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，那就是五十年代初、中期。老实说，那时他老人家很惨，大陆上正在批胡适。——那时与现在不同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，正诚心诚意的洗心革面，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。胡适那套太腐朽，要丢到茅坑去——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。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。海外的老胡适，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，任他去“自生自灭”。我那时和我老师比，我觉得在海外，我绝对可以“自生”，我可以打工、开计程车、洗盘碗；而可怜的胡老师，那时贫病交迫，心脏衰弱、胃溃疡……十分可怜，又受洋人忌妒，他再无法自生，却在等着“自灭”，情况是十分凄凉的。他虽然有点养老金，但那养老金，抵不了一场大病。社会是冷酷的。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、半只板鸭，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，和一个鞠躬如也，透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

特任大官、太学祭酒的老师，味道是不一样的呢！换言之，我是胡适最失意、最穷困、最灰溜溜的时代、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。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，我对他老人家，读得太多（家庭也有点关系），礼敬甚重，交情是自然发生的，不是哪个机关、哪个政党派我去的。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，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，那时哥大财多势大，把我胡、唐二人的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的缘故，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，痛心的说，我们在讨饭吃。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，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，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关系。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，不是马融绛帐，或程门立雪的关系。在那种关系之下，老师高坐讲台之上，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、叩头的份儿。偶尔老师赐坐，也只坐半个屁股，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，才能表示敬意。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。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。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，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，此其三。

我看到胡老师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——众人皆知胡老师是终身讴歌美国的。但是美国所谓“资产阶级的自由化”，在三十年前，不用说大陆视如蛇蝎，台湾也不会接受——胡适在为程天放所写的《论美国》作序时，就把“这年头”慨乎言之。但是胡适之会全盘接受美国式的“资产阶级的自由化”的。何也？就因他在美国住得太久，知道美国最深，只有他才配说什么接受不接受。胡适在美国住了多久呢？我曾改李白诗，做一首有关胡适的打油诗，念出来大家听听就知道了：

人生七十不稀，胡生七二何奇？前二十年还小，后十年未老，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，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！
所以胡老师的成熟期，有一半以上在美国过了。一个研究胡适的人，要不和胡老师一样在美国长住过，便很难掌握胡适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态。在美国住久了，有一种半中不西的特

殊心态——这一心态平时不易看出，只有观察今日大陆留美学生现状，才能略有启发——从一个古老文化，接触另一个新兴文明，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这种震撼是可怕的。这种震撼，新留学生最明显，老留学生四十年来亦余震未已。胡适震撼显然比任何留学生强大，所以他回国以后，才搞起新文化运动来，因此，我这个在美国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学生，对一位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师的研究，或可弥补国内学者的在某些方面的空白。国内研胡书籍，详中略西，略得可怕，反之亦然，当然，海外学人更得向国内同文学习，以弥补其另一方面的空白，两方相辅相成，才能得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的结论。这也是我斗胆前来班门弄斧的原因之一，向国内同文乞教，此其四。

洞山和尚的批判态度

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？我认为“老师”一辞的意义，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。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。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，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，那就太混帐了。相反的，对老师的全盘肯定，也是病态，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“不受人惑的人”。记得胡氏生前对我们教诲，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语录，以加重对我们的教诲——胡是禅宗史大师——他经常引的一位“洞山和尚”的故事。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。于是有人问洞山和尚说：“你肯先师也无？”意思是说，你赞成你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？洞山说：“半肯半不肯。”其人又问：“为何不全肯？”洞山说：“若全肯，即辜负先师也！”洞山和尚这句话，也是胡适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。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，他的治学方法与胡

适学派本有很大的距离,但是他在替胡颂平先生所编的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上所写的长序,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口头“禅”。足见对“先师”学术思想持“半肯半不肯”的“批判态度”,是任何严肃学派里的“学生”所应该共同遵守的态度。不是某一个“学生”,对他的“老师”的不敬或心存离经叛道、哗众取宠。记得元曲里,有个白话曲牌叫《一半儿》——有一札曲子,描画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爱的故事。那女的所唱的便是这《一半儿》的牌子。她唱道:“碧纱窗外悄无人,跪在床前忙要亲……骂一声可憎回转身,不是奴心狠,一半儿推辞,一半儿肯。”这位女士为什么“一半儿推辞,一半儿肯”呢?因为她如全肯,那就不但辜负了爱情,也辜负了文化。洞山和尚、胡适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学生,对他们的老师,不愿“全肯”,不是不敬爱其“老师”,正是由于“不辜负老师”,才不愿全肯。全肯则没有进步,没有进步,则文化便停摆了。做个胡老师的真正的学生,就要遵从师训,不能全肯,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。

我今天为什么未触及正题,却首先说了这么一大段态度与方法呢?这也是于师训有据的。胡先生说,他一生治学,都是围绕着“方法”二字打转的。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,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。现在再谈谈什么是胡适?什么是胡适时代?这个时代何以离去?又何以“卷土重来”?

什么是胡适?

“胡适”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个单纯的人名。它代表一个“文化整体”(cultural entity)。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

一行的老师，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。例如“文学”（包括新文学、白话文、新诗、新旧文学的比较与批判，等等）、“史学”（包括对旧考证学的再肯定，和对新史学方法的介绍）、“哲学”（包括对先秦诸子、宋明理学的再估价；对欧美传来的实用主义的介绍和对辩证玄学的批判）、“宗教”（包括对佛教禅宗的研究与批判；对耶教的立场与看法）、“政治学”（尤其是对民主、自由等形式和西欧北美的政治模式，和生活方式的介绍）等等。在上述各项中，无一项他不是个开山老祖或总司令。近七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家——不管他是反胡的、拥胡的或左、中、右、独（独立思考也）各派——都是围绕着胡适在打转，不提胡适，话便无从讲起了。在大陆的经验，“开谈不说胡适之，读遍马列也枉然”。

所以“胡适”，这个题目太大了。他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的一座大山。从外面看胡适，亦如从外面看一座大山。古人看庐山，说他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两面不一样。看南岳衡山，有人说“帆随湘转，望衡九面”，也是九面不同。我个人前不久去玩泰山，从泰安宾馆仰视南天门十八盘，才了解到什么叫做“泰山仰止”。苏东坡写他看庐山的经验是“不见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其实看中国任何名山都是如此。只要身入此山中，便必然的不见此山真面目。

胡适便是这样的一座大山。一个学者，误入胡山，搞了一辈子，结果还是不见胡山真面目。如果来他个老办法，从山外看山，来个“帆随湘转，望衡九面”，而每位学者，各有其行道，各有其主观，他也只能否定或肯定胡山的九面之一而已。因此今天我所想讲的，也只是个胡适的笨学生，讲他老师的九面之一而已。通盘检讨，则小子何敢，尚乞听众专家见谅。

在此我想附带插一句话。我每次飞过东京，总欢喜看富士山。有时飞机绕富士山达二十分钟之久，我始终就看不出两样

的富士山来,真是太单调了。将山比山,将思想家比思想家,日本人比我们还差一大段,可能也是地理环境使然——日本没有像我们胡适的一样那种多采多姿的大山。所以我们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要想在历史上搞得多采多姿,也就应该冲出一个小岛的自然环境,然后才能心胸开朗!

什么是胡适时代?

以上说的是“什么是胡适”?但是什么又是胡适时代呢?要了解胡适时代,我们得把整个近代中国这个时代分析一下。我们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、最原始、受了最少外界文化影响的古老民族,在文化上自给自足(sefl-sufficient),无求于人,亦无害于人。在人类文明史上,实在是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。现代的革命家、历史家、评论家,往往把我们老祖宗骂得一文不值。我们老祖宗,可能真的一文不值,但是研究文化学的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优劣,它要比较着看,不怕不识货,只怕货比货——将货比货,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,包括帝王专政的政治制度,可能还是“近代以前期”(the pre-modern era)中最好的一家。这自给自足,十分自满自足的一家,向不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好。可是近百余年来,尤其鸦片战争之后,在西力东渐的压力之下,才发生变化,丧失了自信和自满。因此,我们搞历史的人,可以大胆地说:近代中国是什么个时代呢?近代中国是一个“挑战与反应的时代”(Age of Challenge and Response)。西方文明向我们挑战,我们不得已应战。我们应战得很艰苦,而这一应战也是层次分明的——吃一堑,长一智。

鸦片战争(一八三九——四二)之后,我们应战的方法是

侧重科技性。也就是“坚船利炮”政策。这一时代的发言人魏源(一七九四—一八五七)把这一发展概念化一下,叫做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。这一套着重科技反应的政策,一直延长到甲午战争(一八九四—一九九五),大家才觉悟,中国问题不在科技落后,而是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。政治问题不解决,科技也是搞不上去,搞上去也无用。因此,大家才又集中于政治改革,缓进派乃有康梁维新的“戊戌变法”(一八九八);激进的政治改革乃有孙中山先生的排满革命运动。康梁的缓进派是失败了,中山的激进派是成功了,终于建立了民国(一九一二)。但是民国成立以后,袁氏窃国,军阀横行,事实上却弄得“民国不如大清”。在超过半世纪的改革而国运仍然如此,症结何在呢?仁人志士在绞尽脑汁之后,发现科技落后、政治失常都不是民族病症的根源所在——我们民族的绝症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,百病丛生的文化,非把这落伍的、野蛮的、吃人的旧文化彻底改造不可,否则,其他一切的革命、改良,都是治标之策。因而在 一九一七年以改良起,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、全盘西化终,这个所谓“新文化运动”,出了个大英雄,这个英雄就是胡适之,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,也就是“胡适时代”。

胡适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呢?

胡适时代的内涵是改造旧文化,再建新文明。再建新文明的办法是尼采的名言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”(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),而估定一切价值标准的标准,便是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。凡固有道德、传统制度之不科学、非民主者,则一概锄而去之,要锄得彻底,除恶不尽则新善不立。但是胡适是反革命

的。他不主张大刀阔斧，流血革命，他是“实验主义”信徒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革。改革的最后目标是“全盘西化”；后来他嫌此语有语病，乃改为“充分西化”。可是不论“全盘西化”也好，“充分西化”也好，中国政治社会的最后的型态，便是“美国模式”。换言之，胡适锋头最健，最能颠倒众生的胡适时代之内涵，有四大要项，那就是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实验主义”和“美国模式”。根据胡适的解释：“科学”是一种方法，合乎逻辑，合乎法理，用这种方法，可以在实验中求出真理来。换言之，也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不是像宗教或玄学之中，可作虚无缥缈之谈。“民主”则是一种人类生而平等，生而有其与生俱来的不可分割的天赋人权的个体或团体的生活方式。“实验主义”则是一种由哲学向科学过渡期的哲学。它没有终极真理，只有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真理，真理可以随时制造，随时扬弃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至于“美国模式”则是在科学、民主、实验主义，交互为用的配合之下所产生的一种“较好的政府”、“比较合理的社会”。所谓“全盘西化”者，就应以美国模式为鹄的。

胡适之说，大体上自他一九一七年返国便风靡一时，为青年学生所崇拜。这一崇拜热潮，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盖达于颠峰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，始渐次减退，到三十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渐向左转（此是世界潮流，和一九二九——一九三六美国经济大不景气使然），胡适思想才如他左派学生千家驹所说“臭名昭彰”矣。

至三十年代中，胡适个人思想虽无变动，然已陷入低潮，影响力甚微了。虽然他自己却矢志不懈，坚持到底。

并不实用的“实用主义”

——胡适思想的退潮期

胡适的思想在三十年代已急速退潮；至四十年代，除为数所谓“民主人士”利用为藉口而兴风作浪之外，胡适思想对青年、对政治、对社会，甚至对学术的影响，可说微乎其微；连自称“民主人士”之人，也只搞他们自己的“民主”，而反对胡适的“民主”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说起来也很简单。胡适是服膺“实用主义”之人，而实用主义最基本一条原理便是，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观念都不是真理。真理是有立竿见影底实用价值的；没有实用价值的真理，不论如何动听，只是一些伟大的空话。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、“一点一滴改革”，在那个军阀横行、强寇压境、饥荒遍野、饿殍载道、官吏贪赃枉法、洋奴大班、富商地主、骄奢淫逸的不平社会之下，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值几个钱一斤？“一点一滴的改革”从何改革起？我国古人讥笑宋明理学家，说他们“置天下饥谨于不顾，而空谈明心见性”。胡适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，他“置天下饥谨于不顾，而空谈科学、民主、一点一滴的改革”。这在当时看来，是一场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“伟大的空话”。

胡适底“伟大的空话”解决不了问题，代之而起的，则是“共产主义”和“法西斯主义”了。二者对当时中国的情况，都提出有实用价值的观念。共产党的办法，不必多提了，纵是“法西斯主义”，胡适的“实用主义”也抵挡不了。胡适最好的朋友、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、名教授、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蒋廷黻先生，那时就主张，中国应有个个人独裁效率卓著的中央政府。这办法就是德、意二国，能于短短数年之中崛起，成为世界强权的实用

价值的证明。胡适和蒋氏笔战一通,并不能扭转当时青年对领袖效忠、抗日救国的强烈信心。胡适思想终于受左右两翼的包抄,而一时灰黯无光,形成最大的低潮期,这一低潮期一直延长到五十年代。海峡两岸,一个是尊而不亲;一个是彻底批判、消灭。老胡适只好躲在美国当难民了。

胡适的“执拗”与坚持

但是一个对真理有彻底认识和信仰的人如孙中山、如胡适之,他们和我们之别,便是我们普通人容易泄气,而他们则不顾一切困难而坚持到底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胡适对他的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实验主义”、“美国模式”的四大信仰,一生也未动摇过。

适之先生的一生成就,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,而以他四十八岁(一九三八)出任驻美大使为分水岭。在此之前,胡适是位启蒙大师、学者、思想家和教育家。四十八岁以后,他则逐渐走向民主大师、圣人偶像,而终成为一座自由神像。虽然这神像手中的火炬,需要别人来点燃,但没有神像高举的手臂,这火炬也只是一点海上渔火而已。

由于胡适的倡导、胡适的坚持、胡适的执拗,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,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,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。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:(一)言必有据的“科学”方法;(二)以“人权”、以“健康的个人主义”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“民主”政治;(三)反对流血革命,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“实验主义”;(四)以富强康乐的“美国模式”为今后改革的目标。

卷土重来的事实

上述胡适时代的四大内容，终胡适一生，都是空想。我去年夏季访大陆，在北京和上海有一大批青年学生、作家、新闻记者和我谈话，说他们要搞“全盘西化”，只有“全盘西化”中国才有出路。他们所谓“全盘西化”，事实上便是“全盘美化”，接受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实验主义”和“美国模式”的四大坚持。

这些青年问我的意见，我这位胡适的学生，被吓得自床上跳起来。我拿起胡适的修正实验主义来说，我不赞成“全盘西化”，我赞成“充分西化”。谁知事隔不足半年，“全盘西化”竟然变成全国性的口号，十多万青年上街，来炒个“五四运动”的回锅肉，真大出我个人意料之外。使我想到他们所要求，正是胡适当年所倡导的，也是今日胡适自由神像火炬之下的四大号召。胡适之先生生前，常喜欢当笑话说，大陆上在“追赶胡适的幽灵，怕胡适僵尸复活”，我曾为他这句话，做了一首十四行诗。如今胡适的幽灵果然复活了。胡适的时代，真的卷土重来了，我们可以拭目而待之。

何以会卷土重来？

胡适的时代何以会卷土重来呢？

回答这个问题便是，胡适所搞的那一套，是西方文明的正